

出，郑妥娘以丑角登场，自念“让我风流郑妥娘”。田雯诗中如此称呼，是从《桃花扇》而来。

粗浅地看来，田雯读了《桃花扇》以后，有所感触，就写了此诗。恐怕事情还要复杂一些。我认为田雯对明末那些人物事件自有他的评价，这种评价不能不影响孔尚任的创作。所以田雯此诗与《桃花扇》所写情节、气氛当然是十分协调的了。

对此，我可以举出某些旁证。《选优》一

场，外扮沈公宪，净扮张燕筑，被福王问及是否串过新出传奇时，他们不约而同提出《牡丹亭》、《燕子笺》、《西楼记》三种，而田雯的《度曲》也是以汤显祖、阮大铖、袁于令并驾齐驱。事实上袁于令及其《西楼记》在评价与影响两方面都比汤、阮差得远了。

根据以上所说，《桃花扇》之所以能于1699年定稿，并在当时就产生了十分广泛的影响，田雯所起的作用是无可否认的。

象牙牌及其它

——读《瓶》记失(之六)

台湾学者魏子云先生，曾作《金瓶梅词话注释》(以下简称《注释》)，对《金瓶梅词话》作了大量的、严实的考证。但内中也有一些可商榷之处，笔者在此略举一、二，以求教大家。

三十二扇象牙牌(第16回) 《注释》认为，此“即今日所谓的‘牌九’，共三十二张，可以赌博，亦可以打卦，亦名骨牌。”这牙牌、骨牌不全是今日所谓的牌九。骨牌制源于骰子戏，或称斗牌、抹牌，宋徽宗时颁行天下。以二色成一牌，三牌为一副，刚合骰子的六面。因为创制于宋宣和庚子年，通称“宣和牌。”又因为以象牙制成，亦称“牙牌”。到明代改用骨制，则又称为“骨牌”。初以三牌成副为戏，三牌变化甚多，故又有《宣和谱》一类牌谱对照，至明，则化繁就简，为“斗天九”之戏。至清，三十二张牌增为一百零五张，是为“碰和”，后又变为“同棋”，再增为一百二十六张，是为“花牌”。而原有的三十二张骨牌，才转为“牌九”之戏，至民国初才流行。

业障儿(第43回) 《注释》云：此意为暗中抽取的介绍或佣金……或为当时的隐语。”这一注释，是因为《词话》本中有句：“应伯爵因记挂着二人许了他些业障儿，趁此机会好问他，正要跟随同去，又被西门庆叫住说话”。此业障儿，当为佛家语。因为恶业能障碍正道，谓之业障。即今作孽障，多指前生所作之坏事。《涅槃经》谓：“业障者，五无间罪重恶之病”。《俱舍论》谓：“一者害母，二者害父，三者害阿罗汉，四者破和合僧，五者恶心出佛身血，如是五种名为业障”。后转为骂人之词，言其为我之患，为我之恶果之意。”《金瓶梅》中多有此种用法，如第1回中，称两个待买的丫头为“业障”，便是一例。此便如今之江南的“瘟生”、“小赤佬”之类了。

拿春盘案酒来(第42回) 《注释》云：“意为用托盘端上春季酒菜事”，同书第45回，《注释》又云“拿上春槃按酒”“当是指春日流行的时馐餽饌，斯时正元宵节下也。”这两条注释，都仅将“春”字解释为春季。其实，春台，也作食桌之意。如《水浒》第4回，“春台上放下三个盏子，三双箸，铺下菜蔬果子下饭等物。”同上第6回，有“只见灶边破漆春台，只有些灰尘在面上。”此处，“春”即酒也。《正字通》云，“唐人名酒为春”；《国史补》云：“酒有郢人之富水春，乌程之芸下春，荧阳之上窟春，富平之石东春，剑南之烧春，皆酒名。”因此，或可谓春盘即酒盘，春台即酒桌？

(悠悠)